

# 财产、婚姻与女性独立：爱玛·伍德豪斯的蜕变成长之路

何宏伟

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

DOI:10.32629/jief.v7i12.20300

**[摘要]** 通过考察简·奥斯汀的著名作品《爱玛》爱玛成长的三个关联维度,物质基础、自我认知、反叛意识,揭示了19世纪初期女性自我实现的复杂机制。爱玛的成长既体现了19世纪女性成长的进步性,也暴露了其内在局限性。爱玛·伍德豪斯以经济独立保障情感自由、以理性修正自我认知、以平等意识重构婚姻关系,这为当代女性在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,在实现自我价值与满足社会期待存在沟壑的时候,提供了现实参考意义。

**[关键词]** 爱玛; 成长; 理性; 自我意识

**中图分类号:** O331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## Property, Marriage and Female Independence: Emma Woodhouse's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

Hongwei He

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

**[Abstract]** By examining three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of Emma's growth in Jane Austen's renowned work Emma—material foundation, self-awareness, and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—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mplex mechanisms of female self-actualization in early 19th-century England. Emma's development embodies both the progressivenes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its inherent limitations. Emma Woodhouse secures emotional freedom through economic independence, corrects self-perception with rationality, and redefines marital relationships with an egalitarian mindset. These insights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women facing existential dilemmas and navigating the gap between self-fulfillment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.

**[Key words]** Emma, growth; rationality; self-awareness

### 1 引言

简·奥斯汀的著名作品《爱玛》讲述了女主人公爱玛·伍德豪斯的故事。小说以她的“自我认知”与“成长”为核心叙事线索,从最初“自负而盲目”的乡绅小姐,逐步走向清醒的自我认知,成熟参与社会,这为我们理解19世纪女性的生存困境,她们的精神觉醒提供了鲜活的样本。《爱玛》讲述了宣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爱玛,却煞费苦心地为身边的朋友哈丽特一门好的婚事,中间几经波折,发生了很多阴差阳错的误会,最后才发现一切都是最好安排的故事。在浪漫主义的基调中,《爱玛》融入了理性观察,社会讽刺的元素,呈现出情感与理智、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微妙平衡。爱玛在内省、学习、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的状态。在现代社会中,女性依然面临自我实现与社会期待的这样一个难题。而爱玛以理性调和情感、以经济自主保障精神独立,她的成长为现代女性在不理想社会环境中实现自我发展,提供了有意义的历史参照。

### 2 爱玛的成长之路

#### 2.1 经济独立: 女性成长的物质基石

在19世纪的英国,父权制下的财产继承制度将女性牢牢束缚在经济依附的枷锁中,“女性无法继承不动产”成为社会共识,经济上只能依附于父亲或丈夫。在这样的制度情况下,多数女性陷入“无财产即无自主”的困境,婚姻则成为女性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途径。爱玛却是这一制度下的一个例外。对于通常被禁止拥有财产且在就业方面面临重大限制的女性来说,婚姻变得尤为关键,既是预期的社会规范,也是必要的确保财务安全的手段。当时英国社会女性普遍缺乏经济独立地位,她们无法继承财产,也难以从事大多数体面的职业来养活自己,婚姻几乎是中产阶级女性唯一体面且可靠的“职业”和经济保障。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,女性从事工作不仅宣告了她缺乏男性供养,更会使她失去社会等级。

《爱玛》讲述:“爱玛·伍德豪斯,漂亮、聪明、富有,拥有

舒适的家庭和的性情,似乎把人生最好的福气都汇聚于一身了。”这份“福气”具体表现为爱玛有三万英镑的天价遗产,这相当于中产阶级家庭数十年的收入。这笔遗产为她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,她没有必要像普通女性那样,为每日的“面包”奔波。这种在别人看来无比羡慕的经济独立给与爱玛“永不结婚”宣言的底气。在她看来,婚姻不是生存的必需品,是个人愿望的选择。她有底气。赵莉和张文博(2009)认为,爱玛在家庭中担当主导权的行为,是对传统女性温顺、隐忍旧观念的挑战,对女性意识解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爱玛行使经济权力。小说中多次描写她主持庄园的日常事务。利用庄园的经济资源,她维系着小镇的社交。例如,在为贝茨小姐提供帮助时,“根据贝茨小姐的实际需求,调配物资,既保全她的颜面,又解决她的困境”,并非简单的帮忙。这让她在日常事务中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。

经济独立为爱玛的婚姻选择带来很多优势,她得以摆脱“婚姻作为经济契约”的传统桎梏,情感共鸣与理性尊重成为她婚姻选择的标准。这正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婚姻自主。婚姻对女性而言,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,实际是一场经济交换。经济贫困的贝茨小姐,只能徘徊在婚姻的边缘;哈丽特因出身卑微、无丝毫财产,面对农夫马丁的求婚,她也犹豫不决。爱玛富有,经济独立,无丝毫担忧,拥有拒绝的勇气,只要不符合心意。因此当埃尔顿牧师向她求婚时,她毅然拒绝。她对哈丽特的婚姻进行干预,暴露了她早期的阶级偏见,自我认知局限,但却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她对“情感自由的婚姻”的执着。尽管她最初为哈丽特选择的埃尔顿牧师并非适当人选,但这份“婚姻应基于情感”的理念,从某种程度上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婚姻观不谋而合。在当时英国乡村社会中,婚姻常常被视为一桩关乎家族地位与经济利益的现实安排。女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由其能否结成一门“好亲事”来决定。

最终,爱玛与奈特利先生的结合,成为经济独立保障情感自由的最佳印证。奈特利先生以其绅士风度深深吸引着读者。他不仅拥有优雅的言谈举止,更在化解尴尬、稳定情绪方面展现出过人之处,与他的交往仿佛春风拂面。然而,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士,在爱情面前却并非总是游刃有余。两人的婚姻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你我算计。他们的婚姻,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理性结合。而这种平等和谐的婚姻,其前提条件便是爱玛经济独立,她无需在婚姻中妥协,得以坚守情感自由的底线。

## 2.2 自我认知: 女性成长的精神内核

钱钟书在《围城》中曾言:“女人有两个天生的爱好,那便是爱情与做媒。”武月明和傅俊(1991)指出,爱玛对社会地位的差异极其敏感,这是造成她偏见和无情的重要原因。爱玛自视清高,总认为自己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”,却屡次在他人情感判断上出现致命错误。爱玛早期妄自尊大,目中无人,自命不凡。她的这种自我认知的偏差源于她与生俱来的乡绅阶级特权,也与她缺乏现实磨难的成长环境有关,最终表现为她频繁的情感误判。例如,她将埃尔顿牧师对自己的讨好,误判为对哈丽特的爱慕,忽略了埃尔顿牧师的势利性格本质,也未察觉其言

语中的暧昧都指向自己。这份误判,本质上是她的自我中心导致。除了埃尔顿牧师的情感,她还错误地鼓励哈丽特拒绝农夫马丁的求婚,在她看来“马丁不过是一介农夫,身份卑微,配不上哈丽特”。简·费尔法克斯虽然才情出众、品性端庄,却因出身卑微而寄人篱下。对她,爱玛表现冷漠无情与排斥。她的阶级偏见,不仅让她误判他人的情感,更让她漠视他人的人格。在博克斯山野餐事件中,她对贝茨小姐的刻薄言语,将自己的傲慢展现得毫无遮挡淋漓尽致。这份认知的错误,让爱玛始终活在自我构建的虚幻世界中,未经他人苦,莫劝他人善。她无法看清真实的自己,也无法理解底层女性的真正生存困境。恰如奈特利先生所言,爱玛的眼中,只有自己的世界,只有乡绅阶层的规则,她从未真正看清过他人,也从未真正看清过自己。

奈特利先生与爱玛相识多年,深知她的聪慧与自负,他会直接及时指出她的错误,他曾说:“我看着爱玛长大,她的优点无人能及,她的缺点也同样明显,我有责任提醒她,让她少走弯路。”博克斯山事件,则是奈特利先生对爱玛最严厉的一次批判,也是爱玛认知转变的重要点。当爱玛刻薄调侃贝茨小姐后,奈特利先生,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这份严厉的批判,打破了爱玛长久以来的自我优越感,让她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陈圆圆(2013)认为,奈特利先生的责备使得爱玛羞愧落泪,这表明爱玛在个性上开始出现重大变化,内心逐渐产生顿悟。奈特利先生的引导与批判,并非简单的指责,而是带着善意的提醒。他的每一次话语,都如同一面镜子,让爱玛看清自己的自负、偏见、浅薄。

事件过后,爱玛引咎自责追悔莫及。她首次真正地正视自己的问题,直面自己的心灵,承认自己的“虚荣”“自负”“操控欲”。她开始回忆自己过往的种种行为。每一次回忆,都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为了弥补错误,爱玛主动向贝茨小姐道歉。她亲自登门道歉。贝茨小姐很宽容,这更让她坚定了改变自己的决心。爱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奈特利先生的关系。在告白时,她放下了所有的自负,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平等与尊重。如奈特利与爱玛所展示的那样,当感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,爱情便会水到渠成地降临。阿兰德波顿在《爱情笔记》中曾言:“先经由Z再到A的过程比直接的表达更为有利。”这样的循序渐进,不仅降低了冒犯对方的风险,更让心甘情愿的伴侣能够舒缓地步入共同的未来之中。拉姆基·莱尔曾指出,爱玛的魅力在于她能够自我审视、自我反省并实现自我改造与进步,这种坦白正直的品质令人敬慕。这份告白,标志着女主人公的自我重构已然完成,她不再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对他人的掌控之上,学会了正视自己的缺点,学会尊重他人,学会了用理性与善良看待世界。爱玛自我重构,从自负盲目到理性自省,从自我为中心到尊重他人,成为她女性成长道路上最关键的精神蜕变。

## 2.3 反叛意识: 女性成长的社会实践

19世纪英国社会将女性理想化为“家庭天使”,将“顺从、贞洁、依附”定为女性的行为准则,将婚姻与生育视为女性的唯一价值。“家中天使”这个词,出自英国诗人考文垂·帕特莫,他把担负妻子和母亲责任的女性称之为“家中天使”,为丈夫、

为子女、为家庭生活奉献一切,称之为“贤妻良母”。诗人把这个再神圣化一点儿,说是家中的天使。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指南,明确地说,女人一定要心甘情愿地位居男人之下,要成为别人快乐的来源,同时自己也要获得快乐,因此必须战胜三大敌人,自私、懒惰、虚荣。这就是服务于丈夫,献身于家庭,这就是妇女要恪守的“妇道”。爱玛的宣言“永不结婚”是对这一命运的直接反叛,是她反叛意识的最初萌芽。尽管这份反叛仍限于言语层面,且带有鲜明的阶级特权色彩,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展现出强烈的女性自主意识。

爱玛才貌双全,蕙质兰心,家世显赫,也让她的反叛意识从言语与个人能力的彰显,升华为对性别关系的重构。性情开朗。人生的几大福分让她占全了。“人间清福知多少?占尽春风第一枝。”爱玛亲自执笔构图,细致指导哈丽特摆姿势,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。除了绘画,还擅长设计字谜游戏。这些智力活动,让她摆脱了“家庭天使”的单一角色,展现出女性独有的智慧与创造力,证明女性并非天生缺乏能力。在爱玛看来,“不婚”宣言并非对婚姻的否定,而是对“婚姻作为女性唯一归宿”的传统观念的反抗。她反对女性在婚姻中的依附地位,反对将女性的价值完全捆绑在婚姻与生育之上。爱玛与奈特利的婚姻体现了对传统父权模式的超越,二人构建起一种平等、尊重、理解的伙伴式婚姻关系。爱玛用自己的婚姻,证明了在父权制的框架内,女性仍

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,争取到平等地位。这份对婚姻模式的内在超越,是她成长的最终成果。

### 3 结论

爱玛的成长是经济独立、自我认知与反叛意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。经济独立为她的自主选择奠定了物质基础,自我认知的觉醒让爱玛摆脱偏见,精神成熟,而反叛意识推动她在实践中突破传统的角色规训,最终完成了从自负盲目的乡绅小姐到理性独立女性的转变。她的成长经历对当代女性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。爱玛的成长不仅启示女性要以经济自主保障精神独立,以理性反省实现自我提升,在平衡自我发展与满足社会期待的过程中,也应重视推动性别平等的结构性发展。

### 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陈圆圆.从成长到成熟——《爱玛》的女性成长解读[J].湖北经济学院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13(02):100-102.
- [2]武月明,傅俊.爱玛的成长道路——评简·奥斯汀的小说《爱玛》[J].山东外语教学,1991(03):33-37.
- [3]赵莉.父权传统下反静态的新女性——试析爱玛形象的女性意识[J].东北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9(5):82-85.

### 作者简介:

何宏伟(1976--),男,陕西勉县人,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:英美文学、英语教育。